

第一章 明代佛教与帝王及其 政治文化环境

由有关资料和研究已经可以了解，佛教是在两汉之际经过漫长过程逐渐传入并落户中国的。正是由于这样的时空条件，决定了佛教自传入伊始，面对的即是王权至上君主专制的政权体制和相应的政治文化环境。在王权至上的社会形态中，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帝王及相关统治集团对于佛教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中国古代的僧人很早就总结出一个教训，即“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①这不仅是中国僧人的无奈之叹，也几乎是中国佛教自始至终的教训。而且，也从一个角度概括和说明了佛教与帝王的关系以及中国佛教的定位和地位。

概观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历史即可见，佛教与帝王有着非常密切的因缘。其中有扶持甚至佞佛的帝王，也不乏贬踩乃至汰佛毁教的帝王。

慧皎：《高僧传》卷五“释道安”，《大正新修大藏经》（后简称《大正藏》）第五十卷。

如 东汉明帝的一个“夜梦金人”，^①即成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标志之一。虽然此前已早有相关佛教传入的事迹，而且佛教进入中国也必定已经有了相当一段的传入过程。

又如 梁武帝萧衍 多次把自己舍入寺院，以致朝廷每赎其出寺，便使大量国帑流入寺库。梁武帝还认为，帝王有弘法护法的责任，甚至当时由其敕令制定的一些忏仪规章一直沿用到后世，特别是其加工制作的一篇《断酒肉文》，^②更使得汉地僧人茹素至今。

南北朝时期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更是大多扶持利用佛教，使佛教在南北朝权势纷争战事频仍的局势里仍然得到繁荣发展，佛教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更加密切。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和许多散落各处的许多辉煌的佛教艺术遗迹，都是那个时期帝王支持佛教留下的结果。

而隋朝的文帝杨坚、炀帝杨广，唐朝的数位皇帝以及女皇帝武则天，也都曾是佛教的大外护。中国佛教在隋唐时期发展到空前繁荣鼎盛的水平，虽然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但也不可否认帝王的护持还是对佛教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不过，不少严厉的毁佛行动同样也是帝王们发动和实施的。在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是“三武一宗”^③灭佛，使佛教几次濒临岌岌可危的境地。佛教称之为“法难”。此外，还有些帝王崇

① 参见《弘明集》、《牟子理惑论》、《祐录》、《四十二章经序》、范晔《后汉书》等。

② 见《广弘明集》，《大正藏》第五十二卷。

③ 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时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行动。

道或特别标榜以儒术治国而对释道采取抑制的态度及措施等，即使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严厉的灭佛行动，帝王的宗教认识及其好恶倾向，也使佛教经历了不计其数的小挫折或陷入低迷状态的境遇。

因而 由佛教与帝王及政治文化环境的关系的角度考察 即可清晰看到 中国佛教的兴衰 很大程度地关系于帝王及其世俗权力。所以 所谓“佛法付之国王大臣”，^①便是统治者对佛教与世俗权力关系的一种认同和选择。

就是这样 在帝王对其或尊崇或沙汰的荣辱变换中 无论是作为宗教 还是在思想文化上 佛教业已登堂入室 深植于中国社会中。至宋、元、明、清各朝 即使反对佛教和指责佛教泛滥的言论仍然强烈，并且仍然是沿用夷狄之教或违背人伦等一贯的说辞，但也绝对无可否认佛教已流传十分广泛和深入的客观事实。历代帝王与朝廷不仅不能轻视佛教的现实存在，而且也不得不有对待佛教的态度、甚至要拿出如何对待佛教的相关政策，等等。

可以说 佛教与帝王的关系 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老话题。不过 具体到明代佛教的相关探讨 这还是个重要话题。之所以重要，则与明代的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明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一个王朝，其现实政治文化延承着积淀厚重的政治文化传统，其主流的政治态度，宗教认

朱元璋：《游新庵记》，《全明文》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不仅明太祖认同此说，梁武帝欲做白衣僧正时，也是利用佛经中的这个说法与反对方的僧人进行辩论的。

识，价值取向等等，无不既关联着传统又展现了丰富的现实样貌。明代二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既有明显地延承传统影响的痕迹，同时现实政治文化环境更呈现了明显的变化。从明初极端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到明末强势政治统治的逐渐式微，由明初的政治集权及其并生的文化专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到明后期出现强调人性复归个性张扬的人文思潮；明代后期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社情民风的显著变换等等，构成了丰富多样的明代社会政治文化环境。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或某个阶层的宗教认识，不仅与社会系统中诸多因素，尤其是与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互关联，同时宗教认识的形成或变化，也是社会动态系统中的重要内容。在诸多错综交织的关系中，如果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就会发现，一种社会所延续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文化环境与宗教认识的理念定式、对待宗教的态度倾向以及相关的价值取向等的形成和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因而明朝各代帝王对于佛教的认识、态度，以及对于宗教的好恶，无疑也与其所秉承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所在的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就明朝诸帝个人的具体宗教倾向看，崇佛、崇道、标榜尚儒的都有，佛教的境遇的确也因之而有冷暖之不同。但就整体概观，明代统治阶层，尤其是经过明太祖和明成祖两代帝王的特别强化，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对于佛教的基本看法乃至政策原则。因而，在佛教与帝王及统治阶层这一关系链条上，明代佛教及其发展走势既受到各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及其具体政策的特殊影响，也在大致趋势上受明初明太祖及明成祖强势统治时期形成的佛教认识和对待佛教的政策模式的基本制约。但是，明代社

会虽然是王权至上的社会 佛教与帝王的关系方面 帝王处于绝对的优势，但帝王对于佛教的态度和对于佛教的认识也还关乎政治文化环境。明代后期帝王个人的宗教好恶及其佛教认识和态度，就显示了一定程度地疏离政治功利目的的特点。

本章所述 就是立足政治文化的观察视角 侧重考虑明代政治文化环境因素，将明代佛教与帝王的关系放在社会系统中考察的一种研究结果。因此 所涉及的关联问题 大致有这样几方面：明代诸帝的佛教认识及实际态度是怎样的？其相关认识关系着怎样的政治理念和宗教态度或价值取向？其对于佛教的相关决策选择与传统和现实政治文化环境以及与佛教实际状况的关联影响是怎样的？希望通过政治文化的角度对社会系统中的这样一些相互关系的探讨，以了解明代佛教的存在状态及其意义。

第一节 明太祖对于佛教的认识和态度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在其在位的 31 年中，明朝的典章制度及其政权运行机制基本成型。同时 其实行强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政治 明代的后帝王无出其右者。

更为突出的是 明太祖还是一位对佛教关注颇多的皇帝 不仅有很多具体旨意和行动相关于佛教，还著有不少关于佛教的文章。明朝的佛教政策及其模式也基本定型于明太祖的洪武一朝。所以 明太祖的佛教认识 and 对待佛教的态度 不仅本身即具有典型意义，其重要性还在于对明初佛教的实际生存状态以及

明代佛教政策的制定，乃至佛教在明代的发展趋势，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一）明太祖的佛教因缘与明初佛教

明太祖朱元璋 这位将政权专制程度行至极端的皇帝 是来自社会最底层、有过出家做和尚经历的皇帝。这样的经历无疑使其对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有所了解，而且也必然地对其日后的佛教认识以及对待佛教的态度等有一定影响。

首先了解一下明太祖最初的佛教因缘。“起自寒微”是在明代史书中常常读到的明太祖的老生常谈，不管这是出于怎样的心理或目的，但是绝对的事实。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一穷苦人家。在其少年时的一个天灾地荒、瘟疫肆虐的年头 双亲故去而少失怙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朱元璋寻入佛门。基本可以推断 朱元璋出家当和尚 与佛教结的是栖身糊口的因缘。但是灾疫之年，收其出家为僧的寺庙也难支众口。才做了几十天的行童 朱元璋就不得不离寺 四处托钵化缘去了。

当时正值元朝末年各地反元势力剧烈涌动之际。朱元璋大致是游食在淮西一带，那个地区也是反元秘密组织活跃的地区。相关研究说明 元末反元组织的形态多样 其中多以宗教的旗号为掩护和由头 如白莲教或明教的旗号等 在民间秘密串联 标榜信奉弥勒 宣称弥勒佛就要下生 明王将要出世等 以唤起人们改天换地的希望。在深受元蒙统治者种族压迫和沉重赋役之苦的贫苦百姓，尤其是汉人、南人们中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号召力，在反元情绪激荡的民间逐渐聚集起几股强大的潜在的反元

力量。

朱元璋在这样的下层社会里周游，似乎结交了秘密组织的朋友。因而可以说四处化缘的经历不仅使朱元璋更深入广泛地了解到佛教在民间的实际状况，也了解到那些打着佛教幌子或其他什么教的旗号的民间宗教的状况和性质。这无疑也是影响其日后如何对待这些非正统的宗教的深刻的社会经验。

朱元璋云游三四年后又回到本寺，很难推断那时朱元璋就有多大的抱负，但不久后投向起义军的举动，则至少证实了朱元璋已经建立的社会关系及其思想的倾向性。

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元廷实施“变更钞法”，隔年又决定“开凿黄河故道”，这两项试图挽救元朝政治经济衰败之势的重大举措，却好比是为体弱病人错开了一剂猛药，实则严重加剧了元末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彻底恶变，以至危机四伏，犹如遍地干柴火药。企图用以巩固朝纲的措施，却成了引发大火的引信，而开凿黄河故道的工地就是起火点。在集聚了 15 万之多民夫和 12 万戌军的沿河工地上，监修官吏肆无忌惮地贪污治河经费，严酷督管河工，致使整个工地怨气冲天。秘密组织暗地里在工地上埋了一个单眼石人，并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童谣。借由挖出石人，元末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剧烈爆发，此后，全国各地群雄竞起，厮杀征战连绵近二十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不可阻挡的马蹄踏出的大片土地和有高墙的城池，结果未过百年又丧失掉了。

朱元璋是在大起义爆发的翌年，实际是几个月后，就投到在濠州起兵造反的郭子兴队伍里。朱元璋没受过正统教育，而且还其貌不扬，但是其升迁的速度却非常快。有关研究说，

朱元璋有很多优点，如为人沉着机敏，勇敢善战，好学习，善结交等等。朱元璋这些非常之处，使其不仅做了郭子兴的义子，而且也在征战中赢得了同道和跟随者，积累了自己的资本。从士兵升为军官，而后一步步晋升将军，进而做元帅，继之封为吴国公（1361），后自立为吴王，不过十来年的工夫。最终，朱元璋获得元末反元大起义的最终成果，做了明朝的开国皇帝（1368—1398）。

在朱元璋从社会最底层攀缘到最高统治者的经历中，的确与宗教，特别是佛教，因缘密切。当过和尚，与被称为左道的民间宗教组织有染，但做了皇帝的朱元璋似乎对此是有忌讳的。当时有人甚至只因用了与“秃”“僧”等谐音的字，就遭到了杀身之祸。^①

但朱元璋作为帝王却不避讳利用宗教。在争夺江山的多年征战中，朱元璋善于用兵施计，同时也很注重利用佛神仙等，利用世人的迷信，通过渲染一些玄虚神异的故事以制造气氛，来标榜其是有神佛加持护佑的正义之师、所作所为是奉天承运之大事业等等。

继承大统后，朱元璋看待佛教的角度则随地位局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自然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和角度对待宗教，一般看来，是更着重着眼于摆置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如何发挥宗教的社会效用等问题。但无论如何，仍然可以说是与佛教因缘不解，与佛教交涉很多，以致导致了不同的评价，有的认为明太祖是好释氏教的，有的认为明太祖是限制佛教的。

参见吴晗：《朱元璋传》第七章，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不过 如果概观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对于佛教的态度 即可见 其对待佛教基本是恩威并举 宽严并施。在明初 则主要是安抚拉拢为主，这也符合天下初定时期之社会需要。如新朝伊始 江南名僧大老大多被招 其中之大多数都深感荣幸地到了京城做了新皇帝的嘉宾，并诚惶诚恐地为新朝祈福。而新皇帝在平时的日理万机之中，还时常抽时间与其赏识的僧人坐而论道 甚至阅藏著述 发表议论 对佛教确乎关注有加。所以 明初的十来年里 不少佛教高僧受到皇帝的礼遇 普通僧人也可以随意“日讲夜禅”地游方，朝廷还免除了以前出家时要交官府的免丁钱 诸如此类 显示僧人的活动相对自由 没有受到什么严格的政策限制。

不过 讲经论道和恩礼高僧 并未丝毫影响到明太祖强猛治国的原则。而且随着治国方略的推进，对待佛教也很快地由安抚和宽松转为以整饬检肃为主。自洪武中，当明太祖对国家机构体制进行重大调整的时候，也相应地对佛教实行了官僚制度建设 并且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佛教的具体管理措施 通过整肃佛教，对佛教的运行秩序和社会作用进行世俗化和功能化的强化，将其尽可能地纳入在国家机器的运转轨道。

所以 尽管明太祖是个有佛教因缘的皇帝 而且在明初也被有些儒臣指责为过于优待佛教，但综合洪武时期的整体状况看，明太祖的佛教因缘似乎的确使其更重视利用佛教，其中也许会有情感因素 但那是难以论证的因素 倒是有非常显见的事实表明 明太祖重视佛教的目的就是拿佛教做统治工具 而其佛教因缘则使其更知道如何具体地整肃佛教、如何认定和处理附着于佛教的一些所谓附法外道等，以使佛教成为更好用的辅助工具，

因而无论其优渥佛教高僧还是严整佛教队伍，都是立足于统治需要的立场 也正因如此 其对于佛教采取的限制和整治对于佛教后来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大概要比所谓的扶持的实际效应要更深远 后文对此有具体介绍）

在此，或许可以对明太祖的佛教因缘与明初佛教的关系做这样的解释，朱元璋是从社会最底层经过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奋斗才坐到皇帝宝座上的开国皇帝，其统治理念混杂着因其出身经历形成的一些认识和作为强势帝王惟我独尊的极权意志，并具体落实为实施政治高压和文化专制的严酷统治 同时 由于其极权意志所表征的护卫王统帝位和巩固社稷江山的统治理念中有清醒和务实的特点，这样的特点也必然会反映在对待佛教等宗教的认识和态度上，使得有当过和尚因缘的皇帝明太祖既没有成为梁武帝那样的菩萨皇帝，也没有成为反戈一击的灭法帝王，而是表现为积极地试图以其统治理念和施政方略为基准严肃和调整佛教、将佛教纳入世俗政治的运行轨道以利用佛教服务于维护王纲社稷。

那么，下面就具体看一看明太祖对于佛教的认识和态度是怎样的 以及体现了怎样的统治理念或宗教认识及价值取向 与政治文化传统尤其与现实政治文化环境有怎样的关联。

（二）明太祖的佛教认识与传统政治文化

明太祖朱元璋对于佛教的认识，不仅实际表现在明初对待佛教的政策措施上，也集中反映于明太祖诸多相关佛教的文论中。综合这些相关材料，大致可将明太祖对于佛教的基本议论和态度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 明太祖认为“务释氏而能保其国者 未之见矣”。^① 这是明太祖在其统治者的立场上一再特别强调的观点。

明太祖在一篇游记中很具体地谈论过对于帝王与佛教关系的认识。通过历数梁武帝等数帝沉溺佛道的事例，明太祖议论说 帝王佞于佛道必将怠政而致国废 僧道献媚于王侯则毁及自身并连谤及法，释道之于帝王的意义在于教化愚顽，辅助治化，而“非帝者证果之场”。若帝王没认识到这一点，沉溺于释道，就会“糜费黔黎 政务日杜”。而“市衢嗷嗷 则天高听卑”。结果是“祸将不远 豪杰生焉”。^② 所以 帝王若要“永为人皇”应做的是“宵衣旰食 修明政刑”以使“四海咸安 彝伦攸叙，……昆虫草木各遂其生”^③。

因而 明太祖认为 对于帝王人臣而言 若能使凶顽者敬信佛法 则有利于维护王纲 若能使愚夫愚妇皈依佛僧 则有利于国风淳厚。但是做帝王及为臣子者若流连山林则于民不利。王侯大臣应做的是以政令护持佛法，使之“无有敢谤，听化流行”。^④ 在这方面“非王侯大臣则不可”，^⑤亦是所谓“佛法付之国王大臣”^⑥的意义所在。王臣和僧道各有其维护王纲所应起的作用和应在的位置。

虽说如此，明太祖本人对于佛教，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

《太祖实录》，《明实录》卷四十六。

朱元璋：《游新庵记》，《全明文》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⑥ 同上。

都算得上是过从甚密和关注甚多，以致引起了尚儒者的抗言。

《明史·李仕鲁传》中的一段故事反映了明初儒臣对于帝王与佛教关系的一种认识，以及君臣由此问题产生的冲突。

史曰：“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斓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跃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儒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仕儒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故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摔搏之，立死阶下。……陈汶辉……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数言得失皆切直。最后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仕儒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

其实，李仕鲁是为朱元璋所赏识而提拔的儒臣。事因朱元璋于“洪武中，诏求能为朱氏学者，有司举仕鲁”。^②及至入见，大概李的见解正合朱元璋之意，遂表现出对李仕鲁特别的欣赏，甚至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见晚也。”^③遂当场授官李仕鲁黄州同知，并曰：“朕以民事试子，行诏子矣。”^④结果，“期年，治行闻。十四年，命为大理寺卿。”^⑤可见，明太祖也是儒家推崇朱

① 《李仕鲁》，《列传》第二十七，《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同上。

同上。

同上。

⑤ 同上。

子学的支持者，而且还切实地要将朱子学实际运用于国家治化之具体民事中。显然，李仕鲁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儒生，而是“能为朱氏学”于实际政务中的儒臣，且行之有成，所以其“以辟佛自任”不仅由于对朱子学的认识认同，还有实际业绩的资本做支持。

从这些引文可见李仕鲁、陈汶辉代表的儒臣与朱元璋的冲突具体表现为儒臣反对明太祖将佛教力量介入朝政中，尤其极其不满缙流佞臣对儒臣的诋毁。如陈汶辉亦言：“古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缙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今黜旧宿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缙流儉夫乃益以谗间。……伏望陛下于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彦则太平可立致矣。”^①李仕鲁也认为明代基业刚刚创立明太祖之“凡意指所示即示子孙万世法程”，^②但是明太祖如此注重佛教就是“舍圣学而崇异端”。^③

搬出古来帝王和圣贤之学来劝诫皇帝，几乎就是君权至上的社会为臣子者惟一可以用来盖过帝王权威的法宝。但这里，抬出贤王和举示圣学则说明明初佛门因为明太祖对佛教的重视而被视之为提高了政治地位遂为儒家代表认为是儒家的独尊地位受到了威胁。而其君臣在如何对待佛教和佛教是否可作为政治力量对待的问题上的认识出入，也表明这实际上还涉及政治文化传统与现实政治文化环境的问题。李仕鲁、陈汶辉等儒臣依政治文化传统的政治认识而言，独尊儒术是传统政治文

① 《李仕鲁》，《列传》第二十七，《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同上。

同上。

化之基石 佛教不应介入朝政而成为政治力量 缙流入朝者即为奸佞之憸夫，即成乱相，乃至关乎是否可保太平盛世的存亡问题。的确 历史上 无论是释还是道 介入朝政者不仅多无好下场而且身后几乎皆背骂名。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政教分离意识，而是一种对儒家意识形态统治地位之权威性是与王统的权威性及社稷的安危相一致的政治文化认识的认同。无论如何，明初一些儒臣的言行表明了这种政治文化认识传统的延续。而李仕鲁、陈汶辉等不仅是这种认识理念的坚持者更是维护者 遂不能容忍与缙流同事朝堂 乃至不惜挑战帝王之威以致身死。

但是 朱元璋及其他一些朝臣则有不同的儒释观 其所持的观点也有政治文化传统的渊源，即，在士人是宣扬三教调和论，在王臣则是关注三教关系论。正如朱元璋所认为的那样，专务释氏之教不能保国，但利用释氏之教则有助于维护社稷。而明初现实政治文化环境又是离元朝相去不远，佛教由于元廷的扶持而继续是社会上主要的流行宗教 仍然是重要的文化资源 并保有深厚广泛的民众信仰基础。

问题是，在以儒治国的原则下选择儒家的朱子学为主导理论 是否也要采取朱子学者的排佛辟佛的立场 抑或采取三教调和论而讲三教关系说 显然 明太祖与李仕鲁、陈汶辉那样的儒臣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认同，采取的是摆置三教关系和利用三教的主张。

这场君臣冲突该是发生在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敕建僧道衙门之际或稍后。《李仕鲁》传中还说，由于明太祖拒绝采纳李仕鲁等儒臣的劝谏，以致“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

立僧职”。^①结果是明太祖不仅设置了僧官衙门，并“皆高其品秩”^②。朝廷设置僧官已有历史，明初僧官之设是否因为僧人自请，还是明太祖有此意而僧人逢迎其意，或仅是明太祖的主意，确也是个问题，至少关涉到僧人如何对待统治权威和政治地位的问题。但鉴于资料限制，很难确定到底是哪种情形。现有资料显示，明太祖的主动性可能更强烈一些。在当时所设的僧衙门中，僧录司是最高机构，其中左、右善世品秩最高，是正六品。其实，如果放在比较的尺度上，创制僧职等诸如此类的措施，是朝廷管控宗教的手段，对于佛教而言，却常常是损益难判的。尤其由此连带推出的诸多相关管理措施，对于佛教的发展，更很难简单说是有益或是有损。对此后文专有章节，此不赘论。显然，认为明太祖尊崇释教者主要多是以其洪武前期的作为为依据的。如《万历野获编》的著者沈德符亦认为：“太祖崇奉释教 观宋文宪 宋濂）《蒋山佛会记》以及诸跋 可谓至隆极重。”

不过，与当时一些儒臣的看法不同，后世一些研究者对于明太祖与佛教的关系的评论，却多是认为明太祖对佛教的整饬限制是抑制佛教的，因而明太祖并非是崇教的帝王而是相反者。其实，整体概观明太祖相关佛教的认识和实际措施，则会清楚地发现，其好释氏之教与诏令严厉清理释道二教，并无本质上的认识差别，利用还是限制佛教，其权衡的砝码取决于

① 《李仕鲁》，《列传》第二十七，《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同上。

沈德符：《释道·释教盛衰》，《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 中华书局 1980 年。

其统治政权的现实需要。就像处置其所欣赏的李仕鲁等一样，明太祖也常严厉地处置其曾经赏识的和尚。对于明太祖那样的极权君主而言，极权统治和王统延续，是绝对的权威。这一点也是考量其相关佛教认识认同或方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基准。

由明太祖的文论中还可看到，其对于佛教的认识的确有很现实的一面，乃至将佛国天堂也拉在了世间。如其认为“，佛天之地，未尝渺茫，此等快乐，世长有之。”^①并认为只要帝王善为，王侯大臣善佐“，取有道，保有方，岂不佛法之妙乎？”^②不过，朱元璋有这样的认识，并不等于对天堂地狱等持否定认识。虽然古圣先贤对于神明鬼怪等有智慧的理性的解释，如庄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③孔子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④但朱元璋无非是对天堂地狱神鬼诸说采取了更实用主义的解释和比喻，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是明太祖对于佛教与现实统治关系的期许和美化。

佛国是可以在世间营造的，这该是明太祖对“佛法付诸国王大臣”的意义的认识，也就是所谓务释教不能保国，但利用释教则可辅助治化的意义所在，这是明太祖对于佛教与帝王关系的一个基本看法和态度，也表明其作为统治者，在利用佛教维护统治方面，不惟出于实际功利目的，而是基于对佛教在社会中之位置和作用有比较深刻而成熟的认识。

朱元璋：《心经序》，《全明文》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同上。

③ 《庄子·齐物论》。

《论语·八佾》。

其二 明太祖认为佛教可以“阴翊王度”、“暗助王纲”。

朱元璋在其文论中再三举引柳宗元所谓佛教可以“阴翊王度”的著名论断 表明是对这种说法充分地认可 和对佛教的这种社会作用特别地重视。

那么，何以称之为“阴翊”呢？对此明太祖有特别的解释，其曰：

“佛之道云阴者何 举以鬼神 云以宿世 以及将来 其应莫知 所以阴之谓也 虚之谓也。其圣贤之道为阳教 以目前之事 亦及将来 其应甚速 稽之有不旋踵而验 所以阳之谓也 实之谓也。”

朱元璋的这套议论谈不上高深 无非是柳宗元、张商英以来辩论儒、释、道之社会功能的类似的比附手法。但也不应否认，其对儒释社会功能之不同的微妙之处、以及佛教辅助治化的社会功能之特别所在的认识 则无疑是精辟深刻的 且表述直白而生动。这就是说 儒家说教关涉的是现实的典章人伦的问题 是现世的现实的物理人情，故而是可以通过讲明道理和验证真伪而呈现于现前的。而佛教道教，则多讲业报轮回以及天堂和地狱神鬼等 以非现实的或非现世的难以验证的故事 以及建构玄妙的理论解释现实矛盾，并精致虚构超验的理想归宿。两厢比较 关涉现世的直接揭示物理人情的儒家说教 显示为‘阳’的特征 而为‘阳教’；释道二家则涉及‘幽远不测’的超验领域以及不知来去的过去与将来 遂显示有‘阴’的特征 而为‘阴教’。现实社会单单靠‘阳教’会因必须直接面对当下选择和解决现